论清前期会党的性质

——兼论会党的起源

张　　莉

对中国秘密会党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成果累累，不胜枚举。关于秘密会党的历史地位、会党的产生、组织状况及其性质诸问题。目前，已有大量的专门论著，并给予适当的评价。一些学者公认，中国秘密会党是始见于清代的秘密社会组织，天地会则可推为中国近代秘密会党的鼻祖。近几年来，对天地会的研究更为深入，尤其对天地会起源问题，探讨极为活跃，不同论点，各有依据。笔者认为，既然中国秘密会党起源于清，就应对有清一代的会党组织，做一全面研究，特别对天地会公开活动前出现的会党组织，应作些分析研究，这将有助于对会党的产生、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笔者从事清政府遗存档案的整理工作，对清代官文书记载有关会党的史料多有接触。本文拟以清前期出现的会党史料，分析、论证清前期会党的性质及会党的起源，敬祈指正。

一、清前期会党概况

清乾隆中期，是论证天地会起源诸观点中时限最晚的一种观点。我们且以此为时限，凡于乾隆二十六年以前所产生的会党，称之为前期会党。

自清王朝入关后，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出自民间下层群众有组织的反抗斗争，比比皆是。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组织都称之为会党。根据清代档案的记载，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各地发现立有不同会名的组织不下十余种。这些组织，以聚众烧香或歃血订盟、拜把立会，或传布揭帖、习武练兵等形式进行活动。如安徽宿州有探花、大刀二会，寿州有五岳会，定远县有抬天会，南陵县有三乘会，颖州有罗汉会，其地区涉及到闽、粤、江等沿海地区，而且云、贵、川等内地亦有。从时间上看，目前档案上记载最早的是雍正末年查获的抬天会、车会、五岳会。就其立会目的、入会人员成分、组织状况及活动方式等方面，则各有不同。本文拟按地区及查获时间先后为序，列举九个会党的情况。

（一）内地会党概况

清前期在内地直隶、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四川、江西等省分均有不同名目的会党，仅列举比较有典型的几个作一介绍。

1、抬天会

抬天会又名尖刀会。关于该会名目的来源，据说入会的人都是挑脚夫，这些挑脚人力气大，可以抬几百斤，因此他们经常说自已不但能抬货，连天都抬得动，故名抬天会。又有人说，会内的人力气大，做事不让人，说话也很锋利，人们都不敢与会内的人争斗，所以又叫尖刀会。该会由安徽凤阳府定远县谢东升等人倡立。产生于雍正年间，于雍正十三年闰四月被查

获。据会首谢东升供：会内共有十余人。曾在定远县北炉桥开酒饭铺子，平时常有温二乔等十余人来铺内喝酒吃饭。这些人都是挑脚的，赚了钱就到店里，大家同吃攒盘会。久之，大家即共同推举小的当会头，并无更多的活动。

2、五岳会

雍正年间，安徽寿州府鲍文光聚众烧香，倡立五岳会。张东明等九人附和入会。不久被官府发现。雍正十三年，经江南总督赵弘恩奏报，清政府以鲍文光结党行凶，霸占行市给与处治。

3、车会

车会之名主要源于入会之人多为推车之人。该会产生于雍正年间。最早见于山东高唐县民间。其活动地区主要在山东、河南、直隶等省。会头称盘手。会内立有暗号，凡是入会者都要在所推车上插雉尾，或悬挂碎铃、或挂小磁瓶，或刊木为傀儡，或结绳穿缀琉璃，或涂车轮颜色，种种不一，唯同会之人相望而识。会内并无统一领导，各地推选本地有声望者为盘手。同会之人往往结伴在路，互相照应，防止他人欺凌。每年各地会众分别于寺庙处约会数次。届期各车户齐集，多者百十余轮乃至数百辆。聚会期间，演戏、聚饮，会毕而散。每会纳钱数百文。以后此会又有发展，一些地方衿绅、监生为了做会首，争相做经纪人，市井无业之人，亦应招入会，由会给予车辆做为资本。其会中之人，有在外生事犯法，被官府拘执之事，则以所积之会钱，资其缠用，会众一并奔走相救。雍正十三年九月，经河东总督王士俊等奏报，奉旨察明该会情况。

4、箩筐会

乾隆八年，湖北地区发大水，灾民无食，而地主乡绅却囤积粮谷，使米价昂贵。京山县民侯正卿等人，倡立箩筐会。以此会作为组织饥民向富户强借米谷的组织。不久，即被官府查获。

5、铁船会

乾隆十二年六月，四川涪县俞铉彬因其舅父陈子明将其母改嫁，并夺占他家田地，故怀恨在心，欲向陈子明报仇。他曾听说有“铁船教头朱洪生”的名字，就捏称云南有朱洪生，现在西藏用兵地方，不久要出来作皇帝。朱曾在山海关、云南等处，封他为四川提督官职，遂令钱仁贵等招人入会。还说云南、贵州有许多人服从他。钱仁贵是吴世魁的亲家，与俞铉彬素有来往，俞铉彬结立铁船会，让钱仁贵去云贵两省招人，并刊刻印信，书写票文，票上钤用朱印，并用前明洪光年号，“文词多有荒诞、难解之语”。经四川巡抚纪山查报，于该年十月在涪县吴世魁家中查获三张钤有“伪印”之朱票。经追究来由，查明系从俞铉彬处得来。

6、关帝会

乾隆十三年四月，江西建昌府南丰县民饶令德邀约宜黄、广昌二县民人肖其能、唐维瑞等人，在宜黄县唐荣发家中，杀猪宰牛，并将焚表之灰与鸡血一同和入酒中，伊等共同饮酒吃饭后，建立会簿，结拜誓盟，名曰关帝会。立会后，饶令德前往宁都州接受札文。未及行事，即于闰七月为江西巡抚开泰查获。

（二）、沿海一带会党概况

清乾隆年间，由于沿海一带天灾不断，各地方官又时有劣绩，故在福建、广东、江苏等处，下层群众屡屡结立会党，在此列举三个会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1、小刀会

福建是人口稠密、土地紧张的省分。常年遇到丰收年景，一般“尚须邻省接济米粮十余万石”。乾隆七年春夏之际，福建、广东两省少雨，旱情严重，米价腾贵，百姓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福建邵武所属漳浦、诏安、平和等县，联合广东潮州所属饶平、大埔等县下层群众及营伍兵丁，在漳浦县监生蔡怀、买办李珠以及诏安县民何指、白叶乡陈作等人的倡立下，分别聚众拜把，创立小刀会。最初入会者有云霄营兵丁沈秦、黄豹、张昆等十余人。后来，据档案记载，“凡属百姓不法之事，俱有兵丁在内，以至游击、都司、守备等官禀报事件并不将营伍如何整饬……”。会众发展到数千人。会员身上佩带小刀作为暗号。乾隆七年春，这些云霄营下层兵丁在陈作等人号召下，将兵器藏起来并与当地乡民共同传布匿名揭贴，四月经福建汀漳龙道陈树萅访查，拿获该营兵丁张昆等十一人。此案被查获后，漳浦县知县朱以诚移咨，拘拿该营兵丁质讯，而该营游击陈贤生不肯解送，于是知县朱以诚声称要将此案通报督抚，该会首领蔡怀、李珠恐怕事发，祸及已身，遂指使赖石于六月初三日，漳浦知县上堂审事时，潜伏堂边，伺知县上堂审事，即从背后突出，将知县咽喉割断刺死。不久陈作等人商议，于七月二十日，由陈作带领潮州、诏安会众千人，自新径墟直往诏安，围攻诏安县城，迅速蔓延漳浦、平和等数邑。事态扩大后，广东总督庆复才不得不赶快遣人查访奏报，粤省潮州府所属饶平、大埔等处民人有与闽省联合拜把结立小刀会之事。

2、铁尺会

乾隆十三年，福建邵武、建宁一带民人，在杜国祥、杜奇、罗家球等人的倡导下，结立铁尺会。因入会者都佩带小铁尺为记号，故名。此会结立之前，乾隆元年邵武县监生罗家璧与弟罗家球，因年幼父故，恐被人欺负，就邀集罗康松等十一人结拜兄弟，以防外侮，成立关圣会。后来罗氏兄弟长大学习拳棒，与杜国祥、杜奇等人结交相好。杜国祥结联三十五人，于乾隆十三年五月，在下神庙聚集结会，饮酒相约：凡有争产、打降、告状、被人欺负等事，会中都要出面帮助。并立有会单，由会首收存。最初，并非人人都有铁尺，只因会员武艺高强，乡民都很畏惧，故称之为“铁尺会”。乾隆十七年三月，杜奇又邀僧人道三、杜正谟等十人结拜兄弟，加入该会，杜国祥写一会单，其序言写到：我辈欲结同心，必要永久不忘，切勿以酒肉为知己，切勿以患难而罔闻，庶无愧于古人，而别于庸流。等语。本年四月，杜国祥将祖父杜士元在鱼池内拾得的郑成功总兵官铜印取出，杜奇买备三牲，杜国祥撰写祝文，伊等至僧人道三庵内神像前祭告，并斩鸡头立誓，如有背盟之事，即同此鸡。将铜印交给杜正连为凭，令其纠人入会。七月，杜国祥等各言贫困，乃起意制造札副，借李开花之名，声称札副得自彼处，以骗钱使用。并令该会的张继英刊刻本质方印一颗，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乾隆十八年六月经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查获杜正连等入会四十余人，经审讯得知，此等人立会目的是为弄些银子用，同时结识一些好汉，若遇有荒年或风吹草动，以有个帮助。并无明确的政治目的。

3、猛将会

猛将会，又名班指党、霸王党。江苏省奉贤县青村李如岗等倡立。入会之人，俱于大母指上带一个银班指为记号，上刻“忍耐”二字，内刻本人姓名。乾隆十五年六月，于青村附近分贴勾合，会齐众人饮酒聚盟，结成会党。大家推选李如岗、徐鸿表、余三为会首。入会者多为奉贤、南汇、上海、松江、嘉定等处的下层群众，共约有一百二三十人。还未进行其它活动，即于当年八月为清政府查获。

除上述九个比较典型会党外，在安徽宿州、颖州还立有探花、大刀、罗汉等名目的会党。这

些会党虽然没有歃血订盟、焚表散揭等情事，但结会习武练艺等事情却经常不断。不仅如此，在清前期，还有康熙末年台湾朱一贵抗清斗争；乾隆十九年湖北罗田县马朝柱的抗清斗争。由于这两起案件并没有结立会名，故本文未将其列入清前期会党组织之内。但是，在会党研究中，有人将其视为天地会。本文对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不作专门研究，故在此不详加论述。有关朱一贵抗清斗争的问题，本人曾于1989年南京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上提供有《论台湾朱一贵抗清斗争的历史原因》一文，曾论及朱一贵抗清斗争与天地会并无关联。

从上述各项会党的简单情况中，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归纳：

第一，可以肯定在这一时期内，已经有会党组织结立。如果说，天地会产生于乾隆二十六年，那么，在它产生之前的雍正年间至乾隆二十六年以前，即已产生会党组织。不过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组织不能称之为会党，或者说还不是"近代意义的会党"。那么，又怎样对"会党"或"近代意义的会党"下个完整的定义呢？笔者认为，凡结拜立会就应该看作是会党组织。但是，会党的组织形式、口号、暗号以及立会目的等等，则各有不同；而会党组织自身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这个时期的会党组织，应对其所处阶段怎样给予一个恰如其分的划分。

第二，按上述会党结立的实际状况分析，这些处于初期阶段的会党，大都是因时、因事而结立的。从立会目的看，广义上讲，大部分是为寻求"相互帮助"，并没有明确的其他倾向和因素，除各别会党外(如小刀会)，其他组织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色彩。但就其各自的具体情况分析，其中也有为团结抗争而结立的组织。如箩筐会即是为向地主、乡绅强买米谷而结立的组织。而车会则是带有行帮性质的组织。这就使我们又要考虑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价这些会党的性质？

第三，从上述会党组织看，不难看出，这些组织不仅出现于城镇，而且产生于农村。我们从入会者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上分析，大部分群众是贫困者，如帝会中的普通成员大都是推车运脚的个体劳动者；抬天会的成员大部分是搬运工人；箩筐会则多数是贫苦农民。同时在这些组织内，也有少数富者。如关帝会、铁尺会；还有些市井玩闹之徒，如五岳会等。这些人或横行乡里，或欺行霸市。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组织中多有营伍兵丁、马快等人员参加，而有些会党则为监生、买办所操纵。因此，我们又要对这一时期的会党作用给予适当的评价。

第四，从上述会党产生的地域分布上看，这些会党不仅出现于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而且在湖北、安徽、江西、四川等腹地亦有出现，而在直隶、山东等距京畿十分近的地区也出现有流动性很强的车会。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从会党产生的社会根源上加以考虑及分析.

笔者认为，上述四个问题是正确评价清前期会党的关键性问题。如果我们将这四个问题综合起来加以剖析，即可以归结在一点上，那就是清前期会党的性质。

二、清前期会党的性质

众所周知，中国秘密社会组织有两大系统，一是秘密教门，一是秘密会党。当前，国内外学者对这两大系统秘密社会组织的研究有这样的看法：秘密教门主要是农民问题，而秘密会党主要是城镇中下层群众问题。如果展开分析上述说法，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秘密宗教与秘密会党产生的社会根源，前者是由于天灾、人祸，导致社会动荡，使长期处于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生活的广大农民，丧失了生活保障；加之官绅、地主残酷的盘剥，使之生活贫困，或是

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后者是城镇中的下层群众，他们脱离了故有的土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血缘关系及地缘关系，他们在城镇里孤立无援，却又需要在新的环境中谋生。二是，秘密社会组织组成成分的不同，前者是以农村的下层群众，特别是以农民为主体；后者则以城镇的自由劳动者、无业游民或是一些以非正常手段谋生的人为主体。三是，秘密社会组织成立的目的不同，前者需要一种新的精神依托；后者则是寻找一种可以互助互济的依靠。

以上三点对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的内涵与外延作了大致的划定，从中我们对会党的性质，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定义。然而，我们应如何分析清前期会党的性质呢？笔者认为，我们要想对清前期会党的性质做出恰当的评价，就必须剖析这些会党。下面让我们对上述会党组织结立的目的、组织形式、组织规模、活动状况、人员构成等方面进行一下全面分析。

1、结会目的

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多数的会党组织结立目的比较单一，简单地说乃是为了互助，但做具体分析，各自结立的目的就又有所不同。

箩筐会及小刀会是我们列举的诸会党中比较具有明确斗争目标的组织。由于乾隆年间闽粤湖广等地纷纷闹灾荒，水旱灾不断，农田或被水淹，或受干旱的袭击，粮食颗粒不收，农民无粮可食，而富豪之家囤积米谷，抬高米价，使米价昂贵，造成民情汹汹。湖北京山县乡民为了谋求活路，在侯正卿等人倡立下，纷纷组织起来向富户强行借粮，使之无可奈何，不得不借给农民粮食。小刀会亦如此，为了生存，潮诏两地的会众在陈作等人的带领下，数千人围攻诏安县城，使地方官吏大震，急忙下令查拿并上报皇帝。清政府进行了严厉查拿，此后有关该会情况，档案即没有任何记载。倘若我们就以为该组织已经解散。则我们可得出这样结论：该时期的会党因时、因事而立，其目的比较单一、明确，并没有更高的政治目标。

其他组织更是如此，车会是推车脚力夫所立，明显有结帮互济的性质。这些人受雇行车，需要招揽生意，行车途远，又要保证安全。因而需要组织在一起，以便同会之人相互照应。一旦犯法出事被官拘捕，会众亦可借助帮会组织奔走营救。福建邵武县民罗家球、罗家壁，初创关圣会之时，只是怕别人霸占其家产，而邀约十余人结拜相帮。杜奇于乾隆十一年结拜之时，则是为与近村的马丹九等抗衡，而邀约二十九人结拜兄弟，相互帮助。后来两会和并，立铁尺会，无非是扩大自己的势力，结伙逞强。至乾隆十七年，杜奇等又邀约僧人道三等十人结拜兄弟，从其所立会簿序言看，仍是"欲结同心"患难与共。但这时开始制造伪札散卖，以便借李开花之名，诓骗银钱。

猛江会、关帝会，档案中虽无明确记载立会目的，但他们却有散札分贴邀约，焚表饮酒结拜等活动，并立有会簿。一般地说，这种状况下的组织，或是为骗钱，或是为某事而立。

安徽寿州地方所查获的以鲍文光为首的五岳会，则是为"结党行凶，霸占行市"。

2、组织形式

首先，雍乾时期出现的会党，大都是以歃血结拜的形式，进行组织。焚表、共饮鸡血酒盟誓等仪式，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结拜订盟形式。这种传统形式最初用于两国订盟，相互约束，以便双方共同遵守。以后逐渐流传于中国广大乡里民众之中，乡民们以结拜的仪式，相互结为拜把兄弟，以此代替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兄弟关系。这种拜把兄弟只要一经歃血饮酒的仪式，彼此就必须遵守誓约，否则被认为背叛。这种传统形式是封建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人们借助意识形态中民间信仰，以沟通乡民间精神、物质等各种需要。歃血结盟，起初在民间是小生产者出于生活互助和共同防御的需要，而形成的民间信仰仪式。以后人们往往将这种

人间生存所必须的需要，采用超人间的意识形态来约束人们。这种形式在民间为人们视作司空见惯的仪式，同时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就给秘密会党的结立，提供了组织形式上的先决条件。

其次，这一时期的会党组织一般都定有暗号或标志。如车会各帮都有自已的标记；班指党人的大母指上带有班指；铁尺会、小刀会则佩带铁尺或小刀等等。这些暗号或标记一般作为入会人的标志，不论在何地只要见到相同标记者即可相识。这对会内群众起到一定标识作用，而对会外者虽然有一定秘密性，但其程度并不大。就其组织本身来说，由于这些会党结立之初，其目的性并不很强，或是比较单一，因而即便这些标记被人识别，或是为清政府所识破，也不以为然。这就是初期会党组织所有的一个特点。

再次，这一时期的会党，组织形式比较简单，一般都是一次性邀约结立，没有建立庞大的组织体系，也没有订立严密的会规及禁约，发展组织的程序，也没有严格的规定，只是有散札邀人扩大组织的意图。会中即便设立会首，一般也都是倡立者担任，或是以年龄、武艺的高低论序，唯有车会因具行帮的性质，故以盘手为会首，或以衿监代其经纪，以扩大组织。

3、组织规模

这一时期的会党组织大多数规模比较小，惟车会、小刀会规模较大。车会每帮车辆多达数百辆；但各会基本是自为帮派，互无统属；小刀会虽然有带领“贼众数千围诏安城”的行动，但其会员数字，档案没有确切记载。其余会党组织，一般都在十几人至几十人不等的数量内。从其活动地域上看，虽然直隶、山东、河南、湖北、江西乃至沿海的闽、粤、江等省都有名目不同的会党组织，但是其活动范围多限于一乡一地，并没有形成各省联合的形势。因而，对清王朝并没有构成大规模的抗争力量。

4、会员结构

这些会党的人员结构比较复杂，各会之间差异很大。如箩筐会基本会员是贫苦农民，他们为了借粮度荒而组织起来。车会与抬天会是以个体劳动者车夫、脚夫为主体，后来车会渐为衿监所把持，并将市井无业之人招入会中，给予车辆作为资本，使初期仅为互助搭帮行车的车会，形成了帮派体系。有的会则是市井豪强之徒，结伙势众以便横行乡里，欺行霸市。特别是铁尺会人员复杂，罗家壁是监生，初虑受欺而结会，后结识杜国祥等合立铁尺会。杜国祥、杜奇等人都是些拳棒师傅，联络营兵、马快等，入会者虽然多为乡民，但亦有衙役等人。小刀会中多为营兵，其会首为监生、买办，又受到营员的庇护。但从总的情况看，这些会党成员、基本上都是本乡本土的民众，并非是流落他乡的流民。

5、活动特点

上述九个会党中，除小刀会、箩筐会是以强借、围城等形式向官府与衿绅进行斗争外，其余会党大多数都是没有明确政治性目的的活动。一般只是限于遇事相帮而已。铁尺会借李开花之名制造札副散发，不过只是为了骗钱而已。据杜国祥所供：“原想弄些银子用，也要结识好汉，倘遇到荒年风吹草动就有了帮助。”散发结帖，制造札副的活动由来已久。一般多为编造无端故事，以便骚动人心，骗取银钱。至于铁尺会所借李开花之名，与雍正五年，山西泽州等地翟斌和欲与潘道人纠集愚民，借传陕西有一李开花，又名李九桃，声称潘道人辅佐李开花举事。后来翟斌如等与白莲教的张进斗结为党羽，以及与乾隆十七年湖北马朝柱案内之李开花即李荣爵，在西洋统兵与军师吴承云(吴三桂子孙)保幼主朱洪锦之说，及查办天地会的供词中亦有天地会的创始人为朱、李二姓，也有李九桃之名等一系列说法，显然均为一脉相承。但

这种传言一般都是假托，用以达到各自的不同目的。

从上述五方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清前期的会党是以乡村、城镇下层群众为主体，以遇事相帮为主要目的、利用传统歃血结盟形式而建立的，处于初级阶段的民间结社组织。

三、会党的起源

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可以认定，清代会党应产生于雍、乾时期。近代意义会党是有明确政治目的、以城镇下层群众为主体的秘密活动的组织。这一观点已为学者所公认。就前期会党概况分析，这时期的会党组织，虽然尚未完全具备近代意义会党的性质，但已具备其中的某一点或几点特性。因此，我们说它是近代会党组织的前身，或称之为初级阶段的会党。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它与近代会党有所不同，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时结立的会党，已经打破了传统的金蓝结拜的模式，并且与城镇中的封建行帮组织相离异。其一，异姓结拜兄弟的传统民俗，是在血缘关系之外的、扩大宗族间联系的一种举措。其实质是维系封建宗法制度；而会党组织的出现，则是脱离了原有血缘与地缘关系的禁锢，旨在冲破封建宗法制统治的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其二，传统的封建行帮，做为封建社会在城镇中的基层统治机制，对商业与手工业的经营进行着管理与控制，从生产到经营、分配等各个环节，均立有严格的行规，从而将本行会内的所有店铺，完全纳入其控制之下，成为封建政权在城镇中的统治基础。会党已全然不同，虽然在前期的个别会党中，尚遗留有行帮性质的痕迹，但它是在原有行帮之外形成的一股新的社会力量，是封建统治体系无法直接控制的盲点。因此，我们认为，清前期会党，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群体。它的出现，延袭了传统结拜等民俗形式，也受到了封建行帮形式的影响。下面让我们对会党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做一概要的分析。

1、会党产生的社会根源

这里首先应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把会党产生的社会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中国广大农村中小农经济的解体、土地兼并、部分农民失去土地而外流，背井离乡的人需要帮助等原因。那么，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上述种种情况并不乏见。为什么历代失去土地的流民未曾有过会党这类组织，而恰恰在清代这个时期有了会党产生的条件。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下生活的广大小生产者的共性，而且应当具体分析清代这一时空条件下，他们所具有的个性。谈到会党产生的条件，一般应从两方面论及，一是分析会党组织的成员来源；二是分析会党产生时的社会状况。

清代会党组织的主要成员多为城镇中的自由劳动者、乡勇、游民等下层群众．这些人离开了固有的生活环境、离开了土地及血缘、地缘关系。在清代这一时空条件下，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土地而流亡？

明末清初中国广大地区战火连年不息，兵荒造成人民流离失所，死伤众多，人口下降。据当时史料记载，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者十之八九，留居故土者不过十之一二。人口大量外流，使大片耕地荒芜，这一状况已为历史所公认，在此即不赘言。康熙统一台湾后，实行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政策。其中招民垦荒、实行更名田、蠲免钱粮、取消三饷等政策，是清初恢复生产的重要措施。这些措施使生产得以复苏，农民受到安置，人口逐渐增加。因此，十八世纪初，中国虽已处于封建社会晚期，但以农业为主体的封建经济仍趋向稳定与发展。加之清统治者采取提高单位产量，推广双季作物等一系列措施，使逐渐出现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有所缓和。

因此，这一时期很少有农民因土地兼并、地租率的提高而颠沛流离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清前期出现会党并非由于小农经济解体、土地兼并加剧所致。这时期农民离开固有的土地及血缘关系而流入城镇的主要原因在于：天灾；农村经济的落后；清统治者对农民赋税的加重以及城镇，交通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清雍正、乾隆年间闽、粤、两江、两湖等地灾害严重，水旱灾情连绵不断。据档案记载：雍正年间，山西泽州、广东肇庆等处，分别遭受水旱灾；“乾隆六年两江各属多有被水之处”；乾隆十一年秋，江苏淮阴、徐水等属受水灾；乾隆十三年吴江县遭雹灾等等。由于各地灾情不断，一些民众的家业受到灾害的侵袭，使之无法在故土生存，不得不远离家乡，逃亡在外。这是形成一部分流民的原因。

农村落后的生产力对农民的影响是又一个原因。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减，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展农业，清朝也不例外。清初实行的各项发展农业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收到成效，但从农业生产力水平上看并没有大的发展。如主要农具的犁、锄、耙、水车均无改进，耕作技术依然墨守成规。农民辛苦劳累一年，除交纳赋税、地租之外，所剩无几。特别是明末清初，一部分农民生活意识和习惯发生了新变化。由于战争频繁，政府大量征招乡勇、乡兵。战争结束后，这些兵勇本应解甲归乡。但由于这些人长期当兵吃饷，不愿再回农村种地。他们认为在外结伙混饭比种地更易谋求生存。这部分人中有的即留居城镇另谋生路。战争期间长期流亡在外的农民，生活习惯也发生很大变化，因此他们也不愿再回归故土。这是清初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流民，是清前期会党组织来源的一部分。

清政府的赋税政策存在一定问题是，造成流民的又一个原因。

蠲免赋税政策。史学界公认的说法，清初是轻徭薄赋。如果从农民赋役负担来讲，清康熙中期以后，确实比明末有所减轻。但与明万历年间农民赋役负担相比，清初的赋税并未减轻。这是因为清统治者是在确保政府经费需要的前提下，制定赋税政策的。当时政府每年需要财政经费大约 2000 万至 2500 万两银。顺治年间颁布赋役全书时规定：以明万历年间的实征额数为准。但清初赋税的征收，不可能完全沿用明代的旧例。于是，清政府把全国的地丁钱粮分为原额与实征两类。原额就是按照规定的地亩与人丁数额应征赋税的总和；实征是指每年赋税的实征额。清初规定原额田亩数为 900 万顷以上，比明万历六年定额高 200 万顷。清统治者大幅度提高地丁原额，目的在于提高原征额基数。这样，清政府即便是以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分数实行荒残、灾伤的蠲免，也基本能保证政府财政所需。尽管如此，清初的赋役蠲免量实际是相当有限的。一般只限于灾荒减免，而大部分的荒亡税银，则基本上以包荒包课的形式，派征各地。至乾隆年间才有全年的蠲免。

更名田的实施。清初更名田的措施是史学界公认的积极政策之一。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不难看到其中的消极方面。明代各藩王所遗留的土地，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已有部分回归于农民手中。清政府将这部分土地全部收回，将其中一部分充作旗地、官田、屯田，而剩下贫脊部分，以出卖、租种两种形式分给农民。必须指出的是，更名田一般要比普通民田的赋税高几倍或二十几倍。不仅田赋重，丁银亦重。特别是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地后，大多数地区又将耕种更名田的农民的丁银，摊入赋税总额中征收。这就使耕种更名田的农民比民田的农民丁税高出十几倍。许多文献表明，更名田“粮多赋重，小民输纳维艰”。这种情况，势必给承种这些土地的农民造成很大负担。不少农民不堪重赋的压迫，自动放弃更名田的耕作权，有的

农民甚至拿着契约乞求乡绅接收土地，而出外逃亡谋生。清代沉重的的赋税负担是农民流亡他乡的主要原因。

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是流民增多的重要原因。清代的地租与前代相比，并没有明显的提高。但是清代乡绅利用宗族血缘关系控制土地，对地方官府隐瞒实际土地数字，故而清政府掌握的土地数字并不实。乡绅即对其所控制的土地及人丁实行偷税漏税。而正常的税额以及包荒包课的负担大都转嫁给农民，从而使部分农民难以承受其负担而逃亡。

离开固有土地的人们，当他们离开了世代熟悉的生活环境之后，如何寻找一块使之能生存的领域呢？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

众所周知，雍乾时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这一时期，英法等国纷纷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第三等级已经形成，他们联合在一起共同反对封建势力，要求发展生产，保障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大的世界环境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在缓慢地向前发展。清前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镇的发展，特别是交通发达的水陆码头，给这些流亡的人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冲破封建行会组织的束缚，行会对工商业的控制相对放松，从而使城镇扩大了容纳外来流民的可能性。大批流民向城镇靠拢，寻求谋生手段。他们有的加入到手工业行业中，从事小生产劳动；有的到水陆码头当搬运夫；有的在粮食运输线上当车夫等等。总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因而，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逐渐形成共同的生活习惯及意识。由于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容易联合到一起。使之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势力。这就为会党的出现提供了人员来源。

在这种客观条件下，雍乾时期，灾情不断，奸商囤积米谷，粮价腾贵，百姓无法生活，他们聚集起来进行抢粮抗官斗争。据档案记载，雍乾时期，这类案件时有发生，以至形成聚众抗官成风之势。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在给地方官员的一道上谕中写到：“近来屡有聚众抗官之案，相习成风，必当严究痛惩，可传谕安宁，令其审明实在主使及为首要犯，立即杖毙，以儆刁徒，断不可轻纵，其干连各犯一并讯明。”当时湖南长沙、洞庭湖、岳州、两江各府、河南府等处兵民抗租抗粮、抢谷公粮、公开聚众围署事件屡屡发生，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任何事物总是按其规律发展，并存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会党组织的形成也不例外。正是在这种连绵不断的抢谷抗官的斗争中；在清统治者的严厉镇压政策实施过程中，会党组织得以产生和发展。这就是会党产生的社会根源。

2、近代会党产生的思想根源

前文我们探讨了会党产生的社会根源，这些祖祖辈辈依赖土地生活的农民，当他们被迫离开了土地，为了生存而另谋出路的时候，虽然其生活环境改变了，但是他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并不可能变化。所以，我们要研究会党的产生，必然要对失去土地而流入城镇这一新群体的思想状态、社会心理状态进行研究，以探求他们结社立会的思想根源。

农民的社会心理，是在原有的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并互相影响的主体反应。乡里民众在共同的社会活动和历史继承过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日常生活意识。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心理，指农民的日常生活意识，它包括农民的理想、愿望、情感、社会态度、道德风尚以及价值观念等等。农民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农民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众。他们的心理活动与文化层较高的群体相比较，显然缺乏理性思维的机能。他们对于人生、历史、社会的看法和态度，也只是依靠丰富的生产、生活和斗争的直接经验，从而形成一种现实性很强的意识。这种意识的形成与他们的生存条件息息相关，它支配着人们日常言行。具体地说，农

民日常意识的形成，其物质和思想根源是由四个因素构成：即小农业的生产方式、宗法血缘关系的社群结构、以封建正统文化为支柱的社会规范以及小生产者受压迫、剥削的地位。前三点是构成民族特性的外部环境，这是农民和其他各阶层共有的；第四点则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特定的社会环境，这就决定了农民既具有与其他阶级、阶层所共有的民族特性，又具有区别于其他阶级、阶层的阶级特性。基于农民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其所形成的心理状态，如对改朝换代的朴素观感；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要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朦胧向往等等，就与其他利益的群体不同。由于农民被压抑与被剥削的社会地位，并时而激化与其他阶层间的矛盾，他们的生活经常处于精神上无所适从、生存上受到威胁的境地，从而形成一种持续的忧患、紧张和痛苦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乡民群众产生了持久的忧患感、忧伤感和挫折感。这种情感使他们的日常生活意识与政治意识普遍压抑化与情绪化，从而引起乡里民众对信仰的兴趣，他们的心理志向往往也借助于信仰的形式和群体的力量而表现出来。

中国秘密会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与其主要成员的社会心理状态分不开。首先是归属感和依赖感。乡里民众长期蒙受着社会动荡的反复折磨，其生存条件总是处于危机之中。因而，他们倍加感到生存的困难，特别是当他们对某种环境无力判断、无所适从的时候，恐惧心理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合群倾向。他们总是希望缩小人际之间的距离，希望同处于一样境地、一样社会地位以及同一知识水平的人们，能够相互亲近、相互沟通，并经过比较和选择，使相互之间的行为方式能够达到趋向一致。当人们越是普遍感到不安的时候，其心理压抑越是促使他们彼此寻求沟通。这种社会心理，使广大乡里民众，长期以来形成了生活的互相需要与共同防御的需要。因而，人际交往的需求倍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地趋向依靠群体的力量，而会党组织正适应了乡里民众的这种需求。为分散的，缺乏依靠的以及缺乏安全保障的这一社会人群，提供了人际间彼此沟通、彼此依赖的生活空间。也正是在互助互济的口号下会党组织邀约民众形成了。

其次，个体小生产者，在长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劳动过程中，在互助合作方面汲取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进行互助，达到互爱的。这就是个体小生产者长期以来形成的功利心理。这种心理，使他们在社会动荡、正常生活方式被摧毁，人们处于困苦无济、不得不流离失所的时候，强烈地表现出那种本能的互助互利的要求。这是大量乡民们，在脱离了固有的宗族血缘关系与长期共处的地缘关系之后，趋向新结合的必然趋势，也是乡民们心理的本能反映。同时，是会党产生的又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

再次，会党组织所行的歃血誓盟、焚表结拜的仪式，是中国民间由来已久的一种结盟的作法。这种作法，是将人世间生活的必要需求，采取超人间的形式作为规范、约束人们的准则。他们对天盟誓，信仰天地能主宰一切。认为凡是违盟的人就是欺天，就当受到上天的惩罚。从这一意义上说，结盟拜会也带有一定信仰特征。由于乡里民众的社会地位给他们造成的持久贫困，使他们的生活意识、政治意识都超不出感性的、经验的认识范围。他们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关系进行综合批判，而提出理性的信仰，这就必然向宗教信仰滑动。乡里民众长期处于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双重压迫下，文化修养较低，使其认识结构较简单。因而，造成这部分人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以及社会理想等方面，都集中反映在信仰要求上。他们以为现实生活中所无法解释的各种现象，完全可以借助于信仰崇拜，来求得精神上的平衡。当然，会党组织与秘密教门绝然不同。秘密教门的倡立者，借助社会动荡的环境制造灾劫恐怖的传说，使那些以宗教信仰为精神依托的民众，不得不归附于他们所提供的避灾躲邪的教门

之下，以寻求教门所能给予的庇护。而会党组织是通过宗法师承的组织模式和结盟互济的纽带，将一些游离于固有的封建群体之外的人们，组织在一个新的群体中。他们所采取的拜天誓盟的作法，反映着某种习惯行为的民间社团所表现出的民间信仰的性质。

总之，我们研究近代会党的起源，一方面要探讨会党组织形式出现的社会根源，同时也必须探讨会党成员这一新的社会群体产生的社会根源和他们走向结党立社的思想根源，而后者乃是会党起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四、清前期会党的发展与演变

清代早期会党的产生，是在我国小生产经济的基础上、在广泛的民间信仰中发展起来的。它既带有脱胎而来的民间信仰的特色，也受到某些封建行帮组织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十八世纪初期，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已经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在中国，会党组织却刚刚出现，处于这种低级阶段。这显然是长期封建经济基础的顽固存在，与统治者在政治思想等方面进行严密控制的结果。清前期会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广大下层社会中，一种新的社会集团的诞生。前文我们已经谈及，在中国的封建政治体系中，上层是自中央至地方州县的封建王朝统治网；下层则是以农村宗族为纽带及以城镇行会组织为主体的两大统治系统。会党组织出现后，打破了原有的下层社会的统治系统。这种组织既脱离了封建宗族血缘关系，又不受封建行帮的约束。它是下层社会中一种新的集团力量。这个新的集团，与士农工商及地方官府均无任何关系。但是，它却随时都在接收着从那里被抛弃出来的人群；他们不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凡是入会者皆以兄弟相称；他们摒弃旧有的地缘限制，而以五湖四海皆兄弟相论。当他们在一定条件下，从结拜仪式发展为广泛的结会立社时，这就促进了中国会党组织的诞生。而它的发展与演变，则是会党组织与政府间共同变化的结果。让我们从会党的角度，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会党组织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于会党组织的进一步完善，包括组织目的、组织规模与组织形式的发展。其组织成员来源的充足，是会党组织得以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康熙末年到乾隆初年四十余年间，清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有些事件，直接冲击着社会的稳定并影响着下层群众的生计。首先，康熙后期以来，由于统治者长期奉行“无为之治”的政策，以至康熙末年，清政权吏治腐败，尤其是地方官吏的贪赃妄法、亏空钱粮，已经使清王朝的统治感到危机。雍正上台后，深知康熙末年，臣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的种种劣习。他一反乃父“宽仁”之法，以“严猛”二字惩治种种弊端。在此基础上，雍正结合吏治的整顿，开展了清理钱粮亏空运动。雍正上台第四天，就下令户部传谕各省督抚，限以三年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如限期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倘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从雍正元年到雍正三年，各地题奏亏空案件共有一百余起，累计钱粮达 2308 万两之多。为了追补亏空钱粮，他制定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严令亏空官员完纳赔补。但是，可以肯定，无论是亏空的赔补，还是对百姓的追欠，最终都要出自老百姓身上。其次，是军费徭役的增加。自康熙中叶以后，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近半个世纪时间内，人民很少承受战事的困扰。但到雍正初年，由于康熙末年地方亏空严重，使清政府国库储备仍很紧张。雍正皇帝与他的亲信重臣鄂尔泰筹划用兵西藏时，曾谈及他三次备兵三次撤消成命的缘由，一方面考虑政治原因；另一方

面则是考虑国库空虚，而到雍正五年清朝最后进兵西藏时，其户部银库已由雍正元年的1700余万，增至雍正五年冬的5000余万。五年内户部的库储增加三倍；而雍正五年后的连年用兵，其军费开支又主要由各省筹集。这就使百姓无形之中又增加了负担。加之，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的十余年中水旱灾不断，从而不仅造成社会流民的增加，而且民情激愤，使百姓与政府的对抗性进一步增强。这是会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的新的社会条件，从而使会党组织的规模、活动范围得到不断的扩大。与此同时，清统治者进一步感到会党的活动对其统治所构成的威胁。众所周知，康熙时期大清律中即立有对异姓结拜的惩治律条。而到雍正时期仍未得以实施。我们从清政府对几桩结会案例的处置上就可以看到，雍正末年，清政府对会党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雍正皇帝在给河东总督字寄中写到："有人条陈，山东、河南、直隶地方车会一事，可抄录寄信询问王士俊、李卫，此事应否禁约，令其酌量本地情形定议具奏。若不必禁约亦据实陈奏。"说明此案并未列为重案处理，而只是按一般事件来定的。乾隆十八年，乾隆皇帝在对铁尺会的处理指示中写到："看来非大事，将为首者重处，余不致蔓延可耳。不必具惧，具折奏闻。"由此不难看出，此时的清统治者并未以会党的出现而产生恐惧。但到乾隆十九年马朝柱案以后，情况就显然不同了。清政府对会党采取严厉的镇压政策，使会党组织日益以秘密形式出现，这是会党秘密形式日趋完善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会党的发展与其活动方式的变化、人员成分的变化有着直接关系。前文我们已经谈及，我国广大的下层民众，由于经济地位低下，决定了他们处于浅层次、低文化的知识结构的位置上，他们对于社会的动荡及天灾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不可能得出理性的认识，也不可能用自己的理论纲领指导行动。社会动荡的环境，使各阶层人士都难于避免无情的冲击，这就使会党组织随时接纳着从士农工商等各行业中被抛弃的人们。随着会党组织人员成分的变化，一些知识分子加入到组织中来，使会党组织得以不断扩大和发展。到了天地会出现，中国秘密会党已经发展到较为完备的阶段。至于天地会的情况早已被人们所熟悉，而且也不是本文所要谈述的问题。

五、简短的结束

作为近代会党雏形的清前期会党组织，它虽然不如近代会党那样完备，但已具备了会党组织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清代统治最为严密的雍正至乾隆初这二十余年间，初期的会党完成了向近代会党组织的过渡与发展。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产生的历史条件，并有其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客观存在，我们只有用历史的观点去分析研究它，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本文通过对清前期会党性质的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清代会党产生、发展的过程，而且可以进一步认识会党组织的历史地位。同时，从抬天会、关帝会、小刀会等初期会党的成立，到近代会党——天地会的最后形成。从这一演变过程中，不难看出，会党组织从发起时的不完备形式，逐步演变成较完备的高级阶段，其发展脉络，是我们研究会党组织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要方面。

笔者刚刚涉足研究清代会党这一课题，不揣冒昧，罗列拙见，限于篇幅，在一些问题上难以展开，不嫌浮浅，难免挂一漏万，祈望各位学者指正。

文内论及清代会党产生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曾参阅了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及程款《晚清乡土意识》两大作，谨此致意。